



《红高粱》电影中“红色”民俗符号解读

郭重孟,刘妍,林亦修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红色作为一种视觉符号,特定的“符指”对应特定的“所指”。而这些符号在不同民俗场景下蕴含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在电影《红高粱》中,红色符号在“婚庆颠轿”、“高粱酒消疫”及“炸日坦克报仇”等场景的具体运用,体现了一场由“反叛命运”到“重获新生”再到“民族觉醒意识”的文化内涵变迁之旅。

关键词:红高粱;红色符号;符号学;民俗符号;价值观念

中图分类号: K8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14) 03-0078-04

一、民俗符号论的一般论述

由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于1988年在柏林国际电影上荣获最高金球奖。整部影片是以红色为基调,向观众宣扬了一种人性与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因而,若要准确解读影片中所蕴含的文化观念,必须从“红色”开始谈起。在《红高粱》中,“红色”不仅是一种大自然的原色,也是一种展示传统民俗文化的色彩符号。在民俗符号的表述时,“符号”是民俗符号论的基础,如果不能很好的界定符号本身的含义,那么解读民俗符号的象征意义也就无从谈起。古罗马哲学家奥古斯汀曾为符号下过一个简洁的定义:“符号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们想到在这个东西诸加感觉的印象之外的某种东西。”^[1]可见,符号是一种观念意义上的东西,可以是客观存在的实物形态标志,也可以是抽象化概念下产生的物象投射。同时,也可这么说,凡是有意义的一切实物都可视为符号,而且广泛的存在于俗民群体的日常生活中。一旦符号与民俗活动相关联,那么,符号将不再是个体独享思维活动

的观念载体,而逐渐转变为社会群体在集体意识、信仰观念及习俗化活动中共享的文化形态。但民俗符号又不同于一般性的符号形式,是人类创造的一种传承文化艺术的物化载体,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民俗符号作为民俗文化的载体,是用某一民俗事物作代表,并在相应的背景中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即由民俗表现体和它所表现的民俗内涵这两方面关系,成为民俗符号的基本结构。”^[2]在这里,乌丙安先生借助结构主义观点,将民俗符号拆分为民俗表现体与其民俗内涵两部分,足以说明两部分的重要性,且可以视为每个民俗事项中两种紧密相连的民俗元素。民俗表现体是民俗事项外在的实物形式,其民俗内涵即文化内涵则是民俗事项内在的文化内容,那么,民俗符号则是民俗事项外在形式与内在内容互为表里的结合载体。因而,任何一个民俗事项都不能离开外在与内在的民俗元素,否则就不被视为完整的民俗事项。“红色”是一种自然光谱与视觉观念上的色彩呈现,单纯研究它内在意义是没有价值的,必须将其加诸于具体的实物形态与现实的生活情境中

收稿日期:2014-04-20

作者简介:郭重孟(1988-),男,山东邹平人,温州大学12级民俗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民俗;刘妍(1988-),女,山东肥城人,温州大学12级民俗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民俗;林亦修(1962-),男,浙江苍南人,温州大学民俗学教授,研究方向:区域民俗、民间信仰。

来揭示其蕴含的文化内涵。

由民俗结构中“民俗表现体与其民俗内涵”所对应的语言学术语便是索绪尔提出的“能指”与“所指”。“能指”即民俗表现体;“所指”即民俗表现体内在的文化内涵。在言语系统中,能指是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是从语言中反映的事物与现象,当俗民群体接受到某种民俗信息时,立即会经过听觉、视觉或其他感觉收取到一个直观或直感的东西,这便是民俗符号表现的第一个元素。这个表现出来的物象,叫做民俗符号的“指符”,“指符”即“能指”。^[3]“能指”仅仅完成了传达民俗符号信息的第一步,只有俗民群体通过自己在现实生活情境下所体验的直观感受去理解“能指”所隐含的多重文化内涵,才能完成民俗符号的“所指”阶段,即真正完成了整个民俗符号信息的传递过程。

在电影《红高粱》中,“红色”作为整部影片的主色调,通过借助不同的实物形态与现实生活场景的展示向观众传达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功能,其本身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也随之变迁。影片一开始便出现一个年轻漂亮、灵气诱人而又红润的待嫁姑娘,红盖头、红嫁衣及红轿子等实物形态将一个婚庆活动的场面表现的淋漓尽致。从表面上来说,红色是一种喜庆与吉祥的象征,是对封建思想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肯定与欢笑;从实质上来看,红色是一种对女性婚姻自由的压抑与扼杀,甚至可视为赤裸裸的钱钱交易。随后,众人泼洒高粱酒消毒及九儿哼着小曲贴窗花的场面,均说明红色被赋予婚姻自由与人性解放的含义,消毒是为了消除老掌柜的麻风病毒,也是九儿在向封建落后的束缚思想挥手告别,追求一种自我人性的解放。之后,在抗日复仇场景下,红色浸染整个画面,同时也透着一缕缕阳光。在这里,红色代表着流血与牺牲,代表着革命与反抗,代表着对抗外族入侵的崇高民族精神。同时,以红色为主体的实物形态所蕴含的文化观念已经由单一民俗婚庆的“吉祥与快乐”上升为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精神,即婚庆的小传统完成了自身的转变,而成为民族精神的大传统。因而,在《红高粱》中,“红色”虽然始终存在,但以其为表现的民俗事项却展示了一场“红色”内涵的变迁之旅。

二、“红色”符号的实物能指

从自然属性而言,红色,与蓝色、绿色共同构成大自然的三原色,是一种基本色,是不能通过其他颜色按照一定比例相互混合而调配的,但可以与蓝色、绿色相互混合而调配其他的颜色。红色的自然属性,一方面证实了红色生成的不可调配性;另一方面着重强调了红色在所有色彩生成中的基础性作用。如果单纯就红色而言红色的含义,那么,以视觉为基础来研究红色实物指符将会变得没有意义,而且红色,也不是凭空臆想产生的,而是借助现实存在的具象

事物来表现的外在物象形态,这种对红色自然属性的界定应该归属于“红色”符号的实物能指范畴。

红色,作为一种吉祥与喜庆的象征,更多地应用于婚俗活动、节会民俗活动及各种日常的生活中。在婚俗活动中,古代新娘子的着装从头到脚都是红色的,迎接新娘的花轿也是红色的,举办婚礼的现场洋溢着一种红色喜庆的气氛。红盖头、红礼服、红绣鞋、红头花、红轿子、红灯笼、红双喜及红对联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被赋予婚俗活动的标志物,也在俗民群体的观念中形成一种“定式思维”,即“见红盖头、红轿子就想某户人家正在举办婚礼活动”,所以红盖头、红轿子等民俗元素在红色能指内涵的变迁中已经成为婚俗活动的专用实物符号。

在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节庆活动中,城市与农村的大街小巷到处挂满了红灯笼,家家户户也会按照自己的心理需求贴上顺心如意的红对联及形式各异的红窗花,如商户会选择“财源广进、财源滚滚”式对联,职工会基于自己工作及交通工具的考虑,更多地倾向于“生活安定、出入平安”的心理诉求。当然,红对联、红窗花等红色符号在节庆活动中的使用并不具有普遍性,主要盛行于春节习俗活动中,意味着除旧迎新,求吉驱秽,从而传达一种对春节过年的祝吉情结。那么,红对联、红窗花可视为春节习俗活动的专属标志物,而红灯笼则是各类节庆活动中普遍应用的民俗元素,其象征意义除了表达喜庆与吉祥之外,还要视节庆活动自身功能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内涵。

除了上述红色符号之外,“红高粱”可视为《红高粱》影片中最基本的红色实物标志。虽然红高粱作物本身不是红色的,但却被众多的红色指符场景所浸染而具有了红色符号的象征意义。在这里,红高粱不仅是自然生命的完美表现,而且是被赋予人的性灵的活生生的生命载体。^[4]在影片中,张艺谋对红高粱的三次描写,均表现了红高粱所呈现的生命神圣性以及个性解放的环境象征,一切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好的、坏的都是在高粱地背景下展开的,如“野合”、“剥人皮”以及“炸日本坦克”等颇具视觉冲击力的红色场景。因而,在《红高粱》中,不论是婚庆活动的红盖头、红轿子,还是喜上眉梢的红窗花,抑或是“无红胜有红”的红高粱,均可视为一种完整的红色实物指符,包含着多重背景下的文化内涵。

三、“红色”符号的民俗所指

在民俗符号传达自身文化内涵的过程中,民俗意图是民俗所指概念产生的基础,而民俗意图可视为俗民群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观念指示,有了这个观念指示的引导,民俗符号的所指才会生成一定的文化意义。当然,在不同的民俗情境下,不同的社会族群中,同一民俗符号的所指概念是不同的,由此便引申出民俗符号具有文化内涵的多样性特

点,但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民俗符号所指的文化概念是相对固定的,因而,上述多样性特点并不是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性,也不是行为主体单纯的主观臆想,而是民俗符号自身的某些特征与行为主体的理解方式相互作用的产物。可以这么说,民俗符号的某些特征是产生文化内涵多样性的前提,行为主体的理解方式是多样性产生的特殊途径,在两者的共同推动下,民俗符号将会呈现出复杂多样的文化内涵。

从多样性角度来看,《红高粱》中以“红色”为载体的具象符号作为一种视觉上的色彩指符,其色彩的多样性特征已经隐藏于不同俗民群体生活的各种生活情境中,随着时代的进步,红色符号的象征意义也在悄然发生转变,且正在进行着由“命运反抗”、“个性解放”到“民族觉醒精神”的文化变迁。

(一)红色婚俗符号的所指

在《红高粱》中,“红盖头”、“红礼服”、“红绣鞋”、“红头绳”等民俗元素作为婚庆习俗的符号,很容易使俗民群体在思想意识中形成“新婚大吉”、“和和美美”、“早生贵子”及“幸福安康”的喜庆与吉祥观念。然而,在影片中,这种喜庆的场面笼罩着女主人公九儿对自己命运不幸的一种反抗情绪。为什么会产生反面效果呢?这是因为九儿在命运上是不幸的,在婚姻上也是不幸的。在命运上,她生于贫困的家庭,自己父亲再给其择偶时,完全站在经济利益上考虑,而非自己女儿的人生幸福上,这也间接地暴露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择偶观的弊端;在婚姻上,她被迫嫁给患有麻风病的李大头,被一头大黑骡子换走了自己的终身幸福,这说明在当时社会情境下,女人与牲畜的地位与价值是相同的,又怎么会有追求自己幸福婚姻的权利呢?在笔者看来,“女儿犹如牲畜”便是封建家长制在封建婚姻安排下催生的恶性结果。“红盖头”、“红轿子”原本作为喜庆婚俗的象征符号,然而在这却是女性走向“荒唐婚姻”的开始,也是女性地位滑坡至牲畜的显著标志。

“坐轿不能哭,哭轿吐轿没有好报;盖头不能掀,盖头一掀必生事端”,这是媒婆在九儿上轿前所说的婚俗禁忌。由于失败的婚姻选择,九儿在颠轿过程中出现了“哭轿”、“吐轿”及“掀盖头”的禁忌行为,而后在神秘高粱地中出现了“半路劫匪”与十八里坡李大头“被杀”的危险遭遇,这难道是违背禁忌行为的一种报应么?还是一种偶然性的巧合?抑或是压抑人性命运反抗的一种体现呢?笔者认为,“半路劫匪”与李大头“被杀”不是在强调禁忌行为的因果报应,也不是一种偶然性的巧合,而是封建社会对人性思想压抑的一种必然性结果,这应是张艺谋所要表现的原始本意。因而,这里的婚俗符号是对女性婚姻选择与人性自由的压抑与扼杀,甚至可视为赤裸裸的钱钱交易,而违背婚俗的禁忌行为却是对自我悲剧命运的抗争与人性自由的完美体现。

(二)红窗花与红高粱符号的所指

在《红高粱》中,红窗花在银幕上仅仅持续了几秒钟。笔者认为,红窗花是春节习俗活动中的民俗符号,具有辞旧迎新、求吉驱秽,过年大吉的象征意义。但影片中所使用的“红窗花”显然不是发生于春节节庆活动中,而是在李大头死后,众人泼洒高粱酒消除麻风病毒的现实情境下。在这里,“红窗花”民俗符号传达出两层含义:一是辞旧迎新,“旧”不是指“旧年”,而是指“旧生活”,由于李大头患有麻风病,烧酒炉上的伙计除了工作挣钱之外,几乎不会与李掌柜谈心聊天,而张艺谋在刻画这些场面时多选用黑色基调,来衬托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心理隔阂;相反,自从九儿掌管烧酒坊以来,凡是老掌柜用过的旧物全部烧掉,也用高粱酒泼洒坊内坊外来消毒,且与伙计同入烧酒炉酿造新酒,营造了一个全新的十八里坡的生活场景;二是自我个性的解放,李大头的死亡可视为传统封建婚姻在九儿身上的自我终结,虽然在此之前,“野合”行为已经发生,但这只是在神秘的高粱地中发生,还要受到封建家长的监督,那么这个监督者便是李大头,只有李大头的死亡,九儿的人性才会解放,这应视为李大头必然性死亡的原因。

在上述中,笔者提到:张艺谋曾对红高粱进行三次细致的描述,而每一次的描述都凸显着红高粱不同的文化特质。第一次描写是九儿在三朝回门路程中,与余占鳌在高粱地中发生了野合行为。在这里,张艺谋并没有极致的刻画两人的越轨行为,也没有凸显“野合”行为中肮脏的污秽的感觉,而是以红高粱为民俗指符来表现一种朴素自由与解放个性的本能需求,也是一种回归自然、天人合一的人性归属。^[4]在野合行为之前,余占鳌匆忙的踩出一片空荡的高粱地,目的是为“野合”营造一个神秘的“圣坛”。这个圣坛不仅是进行野合行为的平台,也是性与人性回归原始自然的大解放。第二次描写是日本人入侵青杀口,大片红高粱被无情的践踏,在践踏的圣坛上呈现了“剥牛皮”与“剥人皮”血淋淋的场面。在此时,红高粱的神秘性已经渐渐削弱,继而被赋予人性的品质。一大片的红高粱被践踏,是为阐释日本人灭绝人性的暴徒行为,而惨绝人寰的“剥人皮”,体现了人性生命被无情的摧残与蹂躏。第三次描写是为报仇而在高粱地里进行的鬼子伏击战,其结果是九儿被打死,众伙计也死在鬼子的枪子下,大量的红高粱再次被践踏,而后随风挺立。与前两次践踏相比,此次红高粱代表着血液与生命,代表着蹂躏与反抗,代表着革命与斗争,同时其象征意义也被提升为国家层面的民族觉醒意识与革命反抗运动的文化内涵。

四、结语

在民俗符号论中,“红色”作为一种视觉色彩的实物指符,在不同的民俗语境下包含着多重文化

内涵。仅《红高粱》一部影片便展现了众多的红色符号,“红盖头”、“红轿子”、“红窗花”及“红高粱”等民俗元素在影片所处的时代环境下蕴含着超乎寻常的文化涵义。“红盖头”可视为悲剧性的婚俗符号元素,代表着服从命运与反抗封建礼教的象征;“红窗花”可视为重生的符号象征,代表着除旧迎新,重获新生的内在意义;“红高粱”可视为神圣化与世俗化交融的产物,不断演绎着神秘性向世俗化,世俗化向神圣化的相互转变历程。基于红色符号的所指含义,《红高粱》所传达的文化观念也随片中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着深刻的文化变迁,由普通的婚俗隐藏下的命运反抗,向颇具春节习俗迎新下的重获新生,再向对抗

外族入侵的崇高民族精神的逐渐演变,这恰恰是影片倡导的“彰显自由、人性解放”的鲜明主旨,也是笔者对红色符号所蕴含的文化含义的一点认识。

参考文献:

- [1] 杜克芮,托多洛夫.语言科学百科全书[M].摩尔市:霍普斯金大学出版社,1979.
- [2] 乌丙安.民俗学原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 [3] 乌丙安.民俗学原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 [4] 王建青.张艺谋电影中红色的运用[J].电影文学,2011,(18):53.

[责任编辑:石芬芳]

The Folk Symbol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d in Red Sorghum

GUO Chong-meng LIU Yan LIN Yi-xiu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 Red is a kind of visual symbol, and a specific operator corresponds to a specific mean. Under different folk scene, these symbols contain different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the movie red sorghum, red symbol in wedding car, rice liquor away disease and Fried day tank revenge scenarios such as concrete application, reflected a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change about fate "rebel" to "rebirth" to "national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red sorghum; red; semiotics; folk symbol; values

(上接第 62 页)

Analysis and Treatment of Common Faults of CNC Machine Tool Feed Motion

SHE Wei, ZHANG Zhen-ming

(Wuhan Instrument Electronic School, Wuhan 430205,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ommon fault phenomena in NC machine tools in half closed loop feed drive control,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ossible causes, analyzes the mechanical, electrical and NC system parameter settings, and proposes the countermeasures to eliminate the faults.

Key words: CNC machine tool; feed movement; common faults; countermeasures